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霸权”启蒙研究

□邹威华 张丽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王强 [四川教育学院 成都 610041]

[摘要] 霍尔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领导者,该学派思想的开拓者以及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为该学派的理论向纵深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霍尔深受葛兰西的影响,“文化霸权”理论一直是其思想发展的主线。通过考察霍尔早期文化理论中蕴涵的“文化霸权”思想,透视“文化霸权”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文化霸权”在霍尔早期思想中的具体表征,能够为我们思考霍尔早期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提供话语空间;为我们剖析霍尔与文化霸权的渊源提供重要的参照点和研究视角。

[关键词] 霍尔;文化霸权;无阶级的意识;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2)01-0099-04

一、“文化霸权”产生的语境

20世纪西方学术界与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于50年代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其具体的标志是1964年由霍加特和霍尔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到如今,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它已经成为并将持续地成为一门为各路学者不断研究的“显学”。这种显学所结出的硕果和研究方向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或“英国文化批判学派”。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伯明翰学派的建立、发展以及理论思想的拓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为伯明翰学派的思想集大成者和思想的领航人。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始终用理论化的(theorizing)理论去武装自己,把文化研究的研究方向从“文明与文化”传统,从“文化与社会”传统,推进到葛兰西的理论以及其理论中的“文化霸权”传统,为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认识霍尔思想早期的“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和切入点。

从霍尔接受葛兰西的语境来看,法瑞德(Grant Farred)对此有深刻的阐释。他认为:“1960年代中

期至1970年代早期,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对新左派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葛兰西的哲学思想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创性词汇主要归功于第二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及《新左派评论》对其进行宣扬,在所有的新左派成员中,霍尔对葛兰西及其理论著作是情有独钟的。”^[1]的确,霍尔与葛兰西的相遇是伯明翰学派有意识地寻找因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所带来的理论瓶颈上的出路的结果,反映出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时视野的独特性。

就霍尔与葛兰西理论结缘的语境来看,罗杰克认为,“葛兰西是对霍尔思想与文化分析影响深刻的知识分子,这部分地反映出霍尔与葛兰西的历史立场上的诸多共鸣之处。像霍尔一样,葛兰西也来自于边缘地带。一战后,葛兰西成就了他无产阶级遇合(conjuncture)的政治成熟。”^[2]恰好,霍尔的左派生涯及社会主义立场部分地与1956年政治遇合相关,受1956年事件的影响,霍尔亲身实践并参与新左派运动。所以,霍尔在出生背景上与葛兰西有相似之处,政治诉求也是如此^①。就接受葛兰西的理论来看,普罗克特认为,霍尔受惠于葛兰西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霍尔赞同葛兰西这样的主张,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复杂的统一体(complex unity),反驳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并期待无产阶级时刻一定

[收稿日期] 2011-09-01

[基金项目] 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09XWW001)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度项目“伯明翰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成果之一(09XJC752001)。

[作者简介] 邹威华(1975-)男,文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丽(1964-)女,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到来。相反的是,葛兰西依据相互作用的多重层面去概括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复杂性。这些层面被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的时刻”。……霍尔偏爱于葛兰西的历史特定性(specificity)与民族-大众的具体特点,并以此去突显理论的力量。……第二,葛兰西理论中的复杂统一体抑制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特权阶级主体。把能动性(agency)放在权力关系中去观照,这些关系是在过程中建构的。他很少指涉阶级支配,而偏爱用“统治集团”或“历史集团”去建构权力关系。……第三,葛兰西捍卫了马克思分析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他认为对文化的解读要放在特定历史社会的实践、表征、语言、习惯及常识中去。他把文化看成是建构民族霸权的基本场域(site)^[3],从普罗克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霍尔在其文化理论建构中,确实真正得益于葛兰西的这些理论和思想。这些理论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霍尔正是基于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诠释,深刻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结合英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等语境,进一步反思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追溯霍尔文化理论问题时,我们也发现霍尔确实是在葛兰西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思考英国社会、文化及政治问题的。同时对霍尔而言,他对葛兰西的接受,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完全变为象牙塔内的纯理论研究,而是另有他用,即把学术中的理论思考运用到现实实践中去,实现理论为现实实践服务的宗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阅读葛兰西可以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思维的风格,以及我们整个政治工程”,同时“阅读葛兰西使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解读马克思,借助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去诠释20世纪后半叶现代世界的现实。”^[4]由此可见,对霍尔而言,葛兰西的理论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武器,是一种重新审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一种阐释英国社会、文化现实和政治语境的理论基石。确实,这种认识与霍尔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所从事和思考的问题是-致的,他正是利用了葛兰西理论中厚重的思想资源自觉地实践着对当时英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批判社会的见解。同时这种认识本身与“文化研究”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二、“无阶级的意识”

尽管葛兰西的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才被英国知识学界所关注,但是霍尔早在50年代就潜意识地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去分析英国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霍尔文化理论建构中的“伯明翰学派”史前史时期。霍尔在史前史时期与新左派时期最主要的论文是他于1958年发表在《大学与新左派评论》上的文章《无阶级的意识》(A Sense of Classlessness)。这篇文章对城市工人社区战后对待消费文化态度变化的分析已经显示出霍尔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的批评立场。戴维斯曾敏锐地指出,“1958年霍尔发表的《无阶级的意识》虽然先于葛兰西著作的英译版,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预示着他对于葛兰西‘霸权’术语的关切。”^[5]所以从理论溯源上看,这篇大作被看成是霍尔文化理论思想中的“文化霸权”建构的理论萌芽。

在《无阶级的意识》中,霍尔认为,在战后繁荣的经济中,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是不断增长的商业及消费主义的结合体。他论述的要旨是:这些大众文化的转型并没有带来阶级差别的消失。“无阶级”(classlessness)受到新兴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不断增长的商业与消费者的“意识”(sense)把工人阶级从先前贫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所以“无阶级”应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sense),而不是一种基本的事实。”^[6]这是战后英国社会生活、政治及文化的真实和具体的写照。霍尔拒绝马克思主义把文化当成被动的、从属的、反映的与还原论的观点,强调文化在社会中的主动的、基本的及构成性的要素。所以从左派生涯一开始,霍尔就密切关注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问题,即“大众文化”问题。正是这种理论视野造就了霍尔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②。

在文章中,他着力强调:像广告等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从属要素对经济基础的反映,还是“社会的构成性要素”。基础不单单是“经济”,也是“构成性的要素”(文化、社会及政治),其中没有哪个具有优先权;所有的要素有助于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霍尔看来,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是僵化的,而是他称为的两者之间的“更自由的嬉戏”(freer play)。同理,上层建筑也可以限定基础。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机械、僵化的关系,还应该体现为上层建筑自己的能动性(agency)。就该理论问题,斯帕克斯指出:“霍尔在《无阶级的意识》中批判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这种隐喻是过时的,不合时宜的。霍尔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导致了战后工业的转型,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旧的阶

级意识被打破了。”^[7]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霍尔在《无阶级的意识》文章的最后脚注中引用恩格斯《选读作品》时指出:根据唯物主义有关历史的概念,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和我对此都没有宣称过。由此,如果有人还强行说经济要素是唯一的决定要素,那他就把这样的命题转变成为了一种无意义的、抽象的、无意识的问题。我们自己创造历史,但是首先是在这种确定的假设与条件下。不幸的是,然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完全理解这一新的理论,并能运用它们^[8]。

以上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最为明确的认识和阐释,霍尔正是以此为基点,强调了“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性,并在学术生涯中首次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这被看成是他在思考英国社会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出的强力的挑战,被视为他的文化理论中“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端。

在对待战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问题上,霍尔强调指出:“工人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4]战后的整体生活方式分裂成一系列的生活方式,这对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系列碎片化的生活模式。这种描写与霍尔90年代所写的“新时代”(New Times)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无阶级的意识》中,霍尔一直强调指出,庸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时的、还原主义的系统。为了理解当代文化就一定要超越这种局限性。“与霍加特及威廉斯背景不同的是,霍尔不能用一种同情之心回顾他们在英国本土生长的孩童岁月,工人阶级文化正面的价值观体现在具体的人们行为中,霍尔对文化研究形成显著贡献是他坚持关切当代的意识。”^[7]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时刻与社会生活、文化及政治的连接成就了霍尔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卓越地位。

霍尔关切“无阶级的意识”还聚焦于英国政治的社会主义建构与他所相信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之间的鸿沟。在他看来,值得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并不以曾经“革命”的发生为开始。霍尔对社会主义看法是它应该扎根于并不完美的现在,而不是理想化的未来。正是这一点,若干年来使霍尔区别于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他被赋予“悲观主义”的名号。不管悲观与否,霍尔认为,首先,要必须看到此刻此地的政治环境,即便这样也许会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失败和偏见。这样的理念彰显出霍尔关注他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当下性、及时性、紧迫性。第二,为学者与知识分子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存封

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分析概念的实体。

同时,霍尔在《无阶级的意识》中对“大众文化”内涵的深刻阐释形成了他写作与思考中一以贯之的对待“大众文化”的立场。“与其他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霍尔认为,文化产品也限定社会与经济。我们顺着霍尔认识的逻辑看,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与大众文化不可分割,大众文化是政治争论的中心问题,而不是从属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产品的确受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它腐蚀了传统的阶级联盟,导致‘无阶级意识’。”^[6]在霍尔看来,大众文化不单单是资本主义愚弄并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它也是潜在抵抗的场域。

大众文化不必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它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的诉求。正如霍尔在《新左派评论》首刊上强有力论述的那样:“《新左派评论》所讨论电影或青年文化的目的,用时髦的话讲,不是去表明我们与时俱进。而是与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想像性抵抗直接相关——社会不满的不断增长的点,根深蒂固诉求的工程,当前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满足人们不满心态的需求,同时,赋予我们生活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直接的意识。”^[6]在霍尔看来,工人阶级不应该回避战后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它必定要进入这样的战斗:现在的大众文化是什么,未来大众文化会变成什么。霍尔正是在《无阶级的意识》一文中把大众文化看成是政治斗争的场域,这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他后来对“文化霸权”问题的思考。

不过就该文章而言,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霍尔借用“无阶级的意识”去指涉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对立关系,把大众文化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但事实上,在霍尔写作的潜意识中“阶级”本身还是构成了他思考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所以《无阶级的意识》还是打上了深刻的“阶级”意识的烙印。体现出霍尔思考问题的本质性特征之一,这也被看成是霍尔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标志性特征之一,突出了霍尔文化理论启蒙中“文化霸权”理论所蕴涵的“阶级”意识。

三、“文化霸权”启蒙的理论价值

《无阶级的意识》虽然是霍尔前伯明翰时期的作品,但是文章中处处闪现出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霍尔对英国左派及工党所肩负的使命与承担的责任,体现出霍尔在思考现代问题上的勇气与智慧。他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庸俗马克思主义,把上层建筑中的“大众文化”从经济基础决定论中成功地解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2, Vol.14, No.1

放出来,用意识形态中的斗争场域去彰显大众文化所蕴涵的内涵及意义。他成功地把大众文化从被动、从属地位变为主动的能动性的实体,这孕育着霍尔思想中的“文化霸权”理论的萌芽。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霍尔模式研究、大众媒介研究、亚文化研究、道德恐慌研究,还是80年代对撒切尔主义与权威平民主义的研究以及90年代以来对身份的政治、认同的政治、差异的政治等问题的论述与阐释,都渗透着霍尔在前伯明翰时期对大众文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哲学思考。

注释

① 葛兰西出生于意大利撒丁岛阿莱镇的一个贫苦家庭中。191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都灵大学奖学金。其间,他放弃学位投身政治运动,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生积极为人民的幸福不断地追求和战斗。霍尔在个人体验上钟爱葛兰西的原因表现在:首先,在出生背景上,霍尔出身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葛兰西出身于撒丁岛阿莱镇。从历史上讲,这两个地方都是被殖民和被奴役的地区,都是被中心边缘化的地区。其次,葛兰西的文化理论对具体历史理论化(theorizing)与霍尔思考问题的遇合(conjuncture)一致,这种对理论的具体理论化的认识表征为葛兰西理论的政治性、实践性、开放性与介入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与霍尔的文化理论中的文化诉求是一致的。第三,从介入文化与政治的语境来讲,他们都是在文化中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求学过程中开始转型,并介入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关切。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霍尔看到了葛兰西文化理论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反思,为他思考英国的现实社会

和政治诉求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点,这被看成是理解和认识他们文化上的共性最为关键性的一点。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同时参见胡芝莹《霍尔》,台湾生智能文化事业出版,2001年版。她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提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而是第二国际内部一部分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全部归因于经济因素即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成为一种“教条”或“机械”的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 [1] FARRED G. What's My Name Black Vernacular Intellectuals[M]. Twin Ci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171.
- [2] ROJEK C. Stuart Hall[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109.
- [3] ROJEK C. Stuart Hall[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109-111.
- [4] HALL S. In Praise of the Peculiar[J].Marxism Today, 1987,vi.
- [5] DAVIS H.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15.
- [6] PROCTER J. Stuart Hall[M].London:Routledge, 2004:86.
- [7] SPARKS C.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C]//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1996:77.
- [8] 转引自HALL S.A Sense of Classlessness[J].University and New Left Review, 1958, 1 (5):32.

A Study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Hegemony" Enlightenment

ZOU Wei-hua ZHANG Li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WANG Qiang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Stuart Hall is the founding figure, leader, thinking path-breaker and epitome of British Birmingham School. He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school. Stuart Hall has deeply influenced by Gramsci, and "cultural hegemony" is the continuous theme of Hall's thought. This paper is mainly to examine "cultural hegemony" in Stuart Hall's earlier cultural theory, probe into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ts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in his earlier cultural theory, which has offered discourse spac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all's earlier though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nd which has offered an important guide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us to penetrat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ll's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hegemony.

Key words Stuart Hall; cultural hegemony;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popular culture

编辑 刘波